

### 第三章 研究假設

#### 第一節 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的階層特徵預測模式 假設

依循著整合階層模式(Mineka et al., 1998)與多層特質預測模式(Kotov et al., 2007)的架構，憂鬱與焦慮之間共同具有一般因子（即負向情感），也共有一些特殊因子，唯一般因子與特殊因子在不同疾患病理上所展現的歸因變異量（amount of variance attributable）不一、或是不同疾患對相同特殊因子的歸因變異量有所不同（Mineka et al., 1998），而獨特因子則是主要用以區分疾患間不同的關鍵。再者，可解釋兩疾患共病現象之因乃為一般因子與特殊因子，獨特因子不參與其中。

本研究欲探討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所共同享有的共同因子、及能區辨兩疾患間的區分因子，整合前述相關文獻，在此假設高 NA（Negative Evaluation）為兩疾患的一般因子，低 PA（Positive Evaluation）與 FNE（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乃兩疾患共有的特殊因子，唯 FNE 表現在社交互動焦慮病理上的歸因變異量較憂鬱病理上大，而 FPE（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則為社交互動焦慮的獨特因子，是區分兩疾患異質的主要關鍵（參見表 1）。再者，因子之間有著階層性的關係，即實徵研究中作為社交焦慮與憂鬱脆弱因子的 NA、PA（Brown et al., 1998; Chorpita et al., 2000; Hughes et al., 2005），屬階層模式中的高階（higher order factor），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受到高階因子的影響，而 FNE 與 FPE 乃階層模式中的低階（lower order factor），為症狀向度，受到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疾患的影響（參見圖 1）。

本假設模式將 FNE 與 FPE 作為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的症狀向度，階層中屬低階，根據於 DSM-IV-TR 中的描述，社交焦慮疾患一般所伴隨的特性之一為對批評、負向評價、拒絕過度敏感，而重鬱發作的症狀之一則為對自我價值不切實際的負向評價、或對過去的小失敗有著罪惡感並關注之，此外，低落性情感疾患的症狀亦包括有低自尊與無能感，故依據上述準則，本假設模式設定 FNE 在本階層模式關係裡應屬症狀向度。而 FPE 此一概念，在 Weeks 等學者（2007）的研究中已表示社交互動焦慮者有著害怕評價的特性，害怕評價包含著負向與正向評價，即害怕負向評價與害怕正向評價這兩個構念是獨立存在的，為隸屬於害怕評價此構念底下的兩個特性，依此本假設模式設定 FPE 應亦屬社交互動焦慮的症狀之一。

表 1

三類別因子假設

因子類別	特質、特徵
一般因子	高負向情感
特殊因子	低正向情感、害怕負向評價
獨特因子	害怕正向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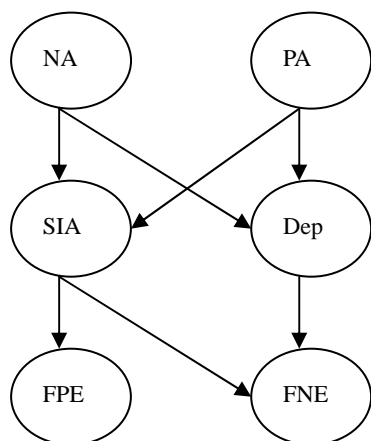


圖 1：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的階層特徵預測模式

## 第二節 競爭模式

本研究另行假設了其他可能的病理模式來與本研究假設模式進行比較，此競爭模式描述如下：

### 競爭模式

競爭模式與本研究假設不同之處在於原本被視為低階、症狀向度的 FNE 與 FPE 被擺放在二階層級 (second-order factor)，而原屬於二階層級的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則置於初階層級，NA 與 PA 在本競爭模式中依舊屬高階因子 (或三階因子)。高階因子 NA、PA 將分別影響著二階因子—社交互動焦慮、憂鬱，作為初階因子的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則受到二階因子的影響 (參見圖 2)。

競爭模式中將 PA、NA 作為高階因子乃立基於 Tellegen (Tellegen, 1985; Watson & Tellegen, 1985; Tellegen, Watson, Clark, 1999) 將情感 (affect) 分成兩向度，即正向情感 (PA) 與負向情感 (NA)，PA 與 NA 兩者間是各自獨立、無關的，並有程度高低之分，且兩者皆與其他情緒主軸「愉悅—不愉悅」(pleasantness-unpleasantness) (如快樂、滿足、或難過等)、以及「激發—不激發」(engagement-disengagement) (如驚訝、或平靜等) 則有著程度不一的關連性，故我們可圖示將情緒分成四條主軸，「高一低正向情感」與「高一低負向情感」軸線互相垂直，這兩軸線又各自與「愉悅—不愉悅」、以及「激發—不激發」軸線斜交，故 NA、PA 可視為情感中的高階因子，其他相關情感幾乎都可被粹取出這兩項因素。在三元模式及其相關理論中 NA 與 PA 被視為高階因子，也已有實徵研究支持之 (鄧閔鴻、張素凰，2006; Brown et al., 1998)。

再者，關於高階因子與二階因子間關係假定之論點如下：NA 乃涵蓋範圍普遍的苦惱因素或特質（general distress factor、trait）（Clark & Watson, 1991; Clark & Watson, 1994; Tellegen, 1985），亦即 Eysenck（1987）的神經質（Neuroticism）特質的概念，高 NA 與苦惱、痛苦、害怕、敵意、緊張不安、神經質、輕蔑等負面特性有關（Watson & Tellegen, 1985），而具有高度神經質特質者容易對負向事件、壓力作反應，即其對負向事件刺激作負向情感經驗、狀態反應的閾值較低，微弱的壓力事件可能就能引發個體的負向情緒反應，故作為 Reiss 期望理論中與發展為焦慮病理有關的三項基本特性之一的 FNE（Reiss, 1991），在競爭模式中我們假設其將受到 NA 的影響，高神經質特質者容易對負向評價做負向情緒反應，故神經質特質越高、越容易有 FNE 的特性，而此 FNE 特性再去影響、預測出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而正向評價在常理上多半不被視為負向事件、或在本質上界定為壓力事件，故在此不假設 NA 將影響著 FPE。

此外，Alden 等人（2007）曾提出「對正向社交事件作負向解釋傾向」的特性是社交互動焦慮與低 PA 間關連性的部分中介變項（partial mediator），並於研究中以問卷施測與階層迴歸分析的方式證實此假設，Alden 等人對此研究所得的解釋為社交互動焦慮者可能對正向社交事件有著負向解釋的傾向，而質疑了正向社交經驗的真實性，也進而維持了對社交的威脅、與不舒服感，以致於深具社交特性的 PA 因之被維持在低程度中難能提升。但由於此研究非實驗法設計，上述推論無法澄清之間的因果關係，孰因孰果難能判定，也可能反向推論為低 PA 影響社交互動焦慮者對正向社交事件以負面有色眼鏡觀之。而如 FPE 這樣的特性亦可能其作用機制類似於「對正向社交事件作負向解釋傾向」在低 PA 與社交互動焦慮之間關連性上作著中介變項的影響，故競爭模式中筆者假設低 PA 將影響著 FPE，FPE 再影響、預測出社交互動焦慮。

低 PA 的概念類同於 anhedonia，為憂鬱疾患相當大的特性之一，在此

假定其可直接預測出憂鬱，其根據為在過往研究中已發現低 PA 為憂鬱疾患的脆弱因子之外（例如：Brown et al., 1998），如此假定亦在避免本競爭模式未有自 PA 為始的路徑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憂鬱，因低 PA 在本研究中乃憂鬱的特殊因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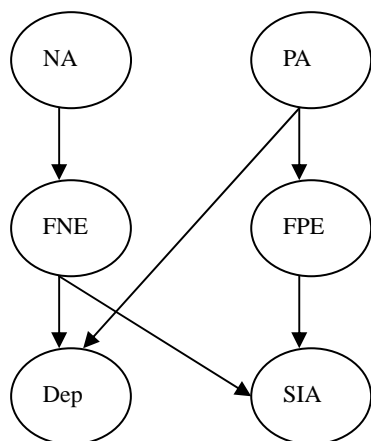


圖 2：競爭模式

### 第三節 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的階層特徵預測模式與競爭

#### 模式的適切性—契合度指標之假設

本研究假定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的階層特徵預測模式，相較於競爭模式，將獲得最佳的契合度指標，即本研究假設模式乃良好的模式，較能適切地解釋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之間的階層病理關係。以下將探討階層特徵預測模式應相較競爭模式，在契合度考驗上結果較佳的可能原因。

競爭模式中假設 NA、PA 與社交互動焦慮、憂鬱間的關連性是透過 FPE、FNE 此中介傳遞，即高 NA、或低 PA 分別致使 FNE、FPE 的特性，爾後 FNE、FPE 再各自影響導致社交互動焦慮或憂鬱的症狀產生。假設模式則是將 FNE、FPE 作為症狀向度，不為中介變項。故兩模式競爭著究竟

FNE、FPE 是作為症狀、或是中介變項？本章第一節曾經提及依據 DSM-IV-TR 的描述，FNE、FPE 應為症狀向度，再者第二節亦曾說明何以高 NA 預測著 FNE 特性，乃因具有高神經質特質者在面對負向事件刺激時，易有負向情緒反應，即能引發高神經質者負面反應的閾值相較於他人是偏低，而負向評價乃一負向事件，故神經質特質越高者，應對負向評價越為敏感。然而上述陳述恐怕有忽略不同個體對於負向事件、壓力事件認知不同的隱憂。如 Kotov 等學者（2006）的研究指出，FNE 在各類焦慮疾患症狀上，乃社交焦慮、慢性擔憂的特殊因子，但與強迫症狀、恐慌症狀無關。立基於此，將憂鬱與社交互動焦慮在階層模式裡視為中介概念應更具邏輯意義，因憂鬱與社交互動焦慮個體可能比起罹患其他疾患的個體更容易將負向評價視為負向事件或壓力，也因此，相較於其他疾患，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個體對負向評價產生負向情緒反應的閾值會偏低。同理而論，假設模式中將社交互動焦慮作為低 PA 到 FPE 的中介，其概念應優於競爭模式中把 FPE 視為低 PA 到社交互動焦慮之中介，其因於，從 Gilbert（2001）的演化心理學點來看，是「社交焦慮」者因憂心獲得關注、與讚美後將惹來他人眼紅以及利益競爭，故低調處事，且有「害怕表現優秀」特性，而就 FPE 概念上來看，主張者 Weeks 等學者（2007）亦表示乃「社交互動焦慮」者有著如此特性，故將社交互動焦慮作為中介變項的假設模式應較具邏輯合理性。

## 小結

本研究比較假設模式與競爭模式孰能更為適切地解釋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間的病理現象，目的之一亦在了解 FPE、FNE 在階層概念底下，能否視為症狀向度。而基於上述原因，筆者認為綜觀本研究所欲驗證、比較的二類模式，競爭模式因在理論上、或實徵研究結果上有著背悖或不易釐

清之處，故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的階層特徵預測模式將在模式契合度檢驗中，獲得最佳的契合度指標，顯示本研究假設模式最能適切解釋社交互動焦慮與憂鬱間的病理關係，了解兩疾患間所共同的因子、共病的可能（包含一般因子與特殊因子），以及可以解釋兩疾患異質的區分因子（獨特因子）。